

以创新驱动应对红利耗竭冲击

张莱楠

4月份经济数据已出炉，内需和外需，进口和出口，存款和贷款，投资和消费均出现同步回落，供给端与需求端都开始趋紧。从数据上看，经济全面下滑超预期。其中当然有短期原因，而更重要的可能预示着，中国经济将面临持续十年之久的“两位数”增长后开始进入下行拐点。

中国经历了十年“超高速增长”，年均GDP同比增长达10.48%。“九五”、“十五”和“十一五”期间，我国经济增长年均计划目标分别是8%、7%和7.5%，但在劳动力供给的快速增长、高储蓄率支持的资本存量的扩张以及生产效率的提高三因素作用下，实际增长均持续超出目标。

目前，支持高增长的供给要素正在变化。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导致的劳动力供给的变化、由政策和人口结构导致的储蓄率变化以及由劳动力再配置格局导致的全要素生产率都会出现变化。

人口红利一直被认为是造就中

国增长奇迹的重要因素。随着人口结构转变的完成，长期以来支撑中国经济高增长的“人口红利”开始衰减。未来十年中国的“人口红利”优势将会逐步衰减，劳动力供给增速下降、劳动力成本提升，整体经济进入了生产要素成本周期性上升的阶段，这预示着现代工业部门已经不能再用工不变工资制来吸收“无限供给”的劳动力，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正在供求不平衡推动下逐步回补，这样工业部门的利润有可能越变越薄，资本形成的增长将会有一定程度的放缓，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减少，中国GDP潜在增长率将出现趋势性下降。

与此同时，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也将趋于减速。2010年我国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已达到46.9%，超过已经完成工业化的国家的历史峰值。据此判断，第二产业很难再出现大的扩张，劳动力转移的速度将会出现下降，并且更多地转向第三产业。

当前，中国经济两位数增长的环境正在变化。第一，人口因素的制约和城市化进程的放慢。首先是总体劳

动力人口的下降。最新数据显示，中国劳动人口比重十年来首次下降。2011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为74.4%，比上年微降0.10个百分点。其次是“刘易斯拐点”的出现，农村还能再转移出来的剩余劳动力的数量已经不是那么多了。再次，是中国老龄化程度，中国第6次人口普查人口老龄化率为8.9%，但2050年左右大概30%，中国老龄化的程度开始在加强。随着“人口红利”衰竭和“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将会放缓。未来中国的城镇化将由加速阶段转变为减速阶段，预计今后城镇化平均每年提高的速度将保持在0.8-1个百分点左右，很难再现“九五”、“十五”期间每年1.35-1.45个百分点的增幅。

第二是“资源红利”衰减后经济增长面临的资源环境瓶颈。中国特有的“过度工业化、过度出口依赖、过度投资驱动、过度粗放增长”的模式，已经严重威胁到中国的可持续发展的上限，它的上限就是资源供给约束、环境质量约束、生态容量约束、气候变化约束。多年来，廉价的自然资源价格为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条件，但也由此造就了经济增长中的高能耗、高污染现象。由于资源本身具有难以再生的特性，因此以不断耗竭资源为代价的经济发展模式必将不可持续。许多资源具有生产的投入要素和消费品的双重属性，环境质量的下降、能源供给和水资源供给的不稳定性、生态环境的恶化将使中国面临长期增长约束。

第三是全球供需格局的趋势性改变。传统模式增长已到极限倒逼中国

增长动力“换挡”。从中长期来看，金融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严重打击了发达国家的支出能力，导致由发达经济体主导的全球总需求出现明显下降，出现了需求不足和供给过剩的结构性冲突。特别是在全球外部不平衡逆转、全球分工体系格局日趋稳定、中国出口产品集中度不断上升所逐步界定的国际市场容量、劳动和资源成本上升和汇率升值的压力以及逆周期的贸易政策盛行五大因素的影响，未来出口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和主要源泉难以维持，并将步入递减区域，中国依靠增加劳动力投入、加快资本形成以及“要素驱动型”模式已到尽头，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亟待实现重大转换。

未来十年，加快要素结构升级，通过人力资本提升、技术提升以及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促进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从“要素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变已经是不可逆转的大趋势。当然，在整体要素结构升级的过程中要符合经济发展规律，要和资源禀赋相适应，结构调整也不要过于剧烈，这样可以避免在“要素红利”形势逆转下，比较优势出现真空的状态。因此，现在最好的延续方式就是一边升级产业结构，一边挖掘要素红利的潜在空间，给经济平稳“着陆”留下缓冲地带。

作者系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副研究员

■算法经济 Li Bin's Column

市场经济的半瓶醋(之二)



李斌

在本期，我们继续讨论宏观经济管理中的某些非市场化的观念与做法。

在西方经济体中，原来基本上不存在“宏观调控”这个领域。由于凯恩斯主义的泛滥，宏观调控成为一种常规性的政府活动。然而，当这个术语传入我国以后，它被曲解了，开始变味了；这就是，政府原来对经济活动所进行的管理，现在则都被重新冠以“宏观调控”的名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行为，如今则摇身一变，举起了凯恩斯主义的旗帜，这些做法于是也就“现代化”了。这看上去相当“有道理”：连资本主义国家都搞宏观调控，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怎么能够不搞呢？

一些人可能是这样来理解宏观调控的：“宏观调控”意味着政府行政部门随时可以干预一切，“调控”一切，而不需要遵守任何规则，不需要接受任何限制。因为，政府的这种“超级能力”正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所在。我们需要发挥这种优越性，而不是限制它。只有这样，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才能得到根本保障，大家才能安心。市场经济的缺陷很大，只能适当加以利用；我们可以“开设”市场，也可以随时关闭市场。如果有一天我们认为市场没有什么用了，或者我们发展得“足够强大”了，也就可以考虑关闭它而回“正途”了。

这里提出了一个关乎国家命运前途的重大问题。市场经济体制至今不能得以牢固确立，是与思想上的此类倾向有关系的。我们暂且不讨论此以正面批驳，转而看看过度的调控将会导致的后果。政府手握众多的可控变量，有时的确便于解决某些事关全局的紧迫问题。但是，政策选择过多，容易助长唯心主义和主观主义的风气，导致决策往往过于草率。例如，随意确定经济指标，凭主观印象和感觉办事。编制计划和规划的时候可能只是几个人随便议一议；可是，到了执行阶段，这些规划就成了天条，不得不遵守了。有些人整天讲这个结构“不合理”，那个“比重”要改变；其实大都是凭空想象。这些人根本不知道所谓“合理的结构或比重”是什么东西，因为这些东西一般没有人能够知道。为什么“科学”这个词在中国总是具有特殊的意义和重要性？对此一些外国人士总是不大理解。“奥妙”就在于，超级权力总是倾向于忽视客观规律，推崇主观意志，忽视不同意见。在此情况下，“决策科学化”这个口号就是约束权力的一种手段。

与此相关的是唯心主义大行其道。例如，有些人显然认为，人们的信心可以作为宏观调控的对象；宣传工作做得好，信心就有；宣传工作不对头，信心就会失去，经济就会发生危机。这是对经济学中“预期”这个概念的滥用。有人认为，物价的上涨是炒作出来的。房价涨了，怪房地产商炒作；食品涨价了，怪投机商炒作。在这些认识之下，为消费者供应房屋、供应食品的工商业者屡遭不公正的待遇。不重视市场基础机制的培育、而把权力集中起来进行相机权衡以便服务于种种短期目标的做法，从长远和全局来看具有很大的害处。虽然一些眼前的问题暂时解决了，但它会对市场的正常运作造成严重破坏。许多行政措施以“市场机制不健全”为理由而得以出台，实际上这些行政措施却在进一步打击市场。一些观察表明，由于决策者的

■舆情时评 First Response

假外资戏码这回演砸了

马建勋

曾经有一位市场营销达人这样说过，中国用户骨子里不喜欢任何针对“中国市场”的产品，如果预算允许，他肯定奔着那些全球化的商品而去，说白了就是要买洋产品。聪明的老板明白，与其在媒体上鼓吹“新国货”，不如干脆化身“洋品牌”，就能让消费者天然地感到亲近。

厦门倍顺连锁店有限公司，就是国内千百家“山寨外企”大军中的一员。据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了解，这家公司大概成立于1997年，出资者美国的倍顺集团。但是2008年倍顺集团从国内撤资，厦门倍顺公司则接手了其中的20家门店。不过，厦门倍顺留了一个心眼：反正没人去查工商登记信息，门店也没啥变化，我还是当我的“美资企业”。

直到2012年5月11日之前，厦门倍顺的经营确实是“一帆风顺”，论及门店的数量、规模、市场占有率及行业经营年限方面，还是厦门同业之首。就在那一天，市场“黑天鹅”已经悄然来临。黑天鹅是美国数学家塔勒布对“发生概率极小但破坏力极大的事件”的比喻，对厦门倍顺来说，当天有网友“久肉搜索”出了他的“前老板”、倍顺集团的创始人洛伊达·刘易斯，赞助了在菲律宾发生的针对中国驻美使领馆的“反华示威活动”。

这下热闹了，由“黄岩岛”问题所引爆的新一轮“爱国热情”，终于可以不用游过南海去表达，原来家里面早就潜伏着一个菲律宾版的“蔡则成”。爱国网友们不仅感到震惊，而且表示“洛伊达·刘易斯从事与自己身份不符，与商业行为不符的政治活动，因为这些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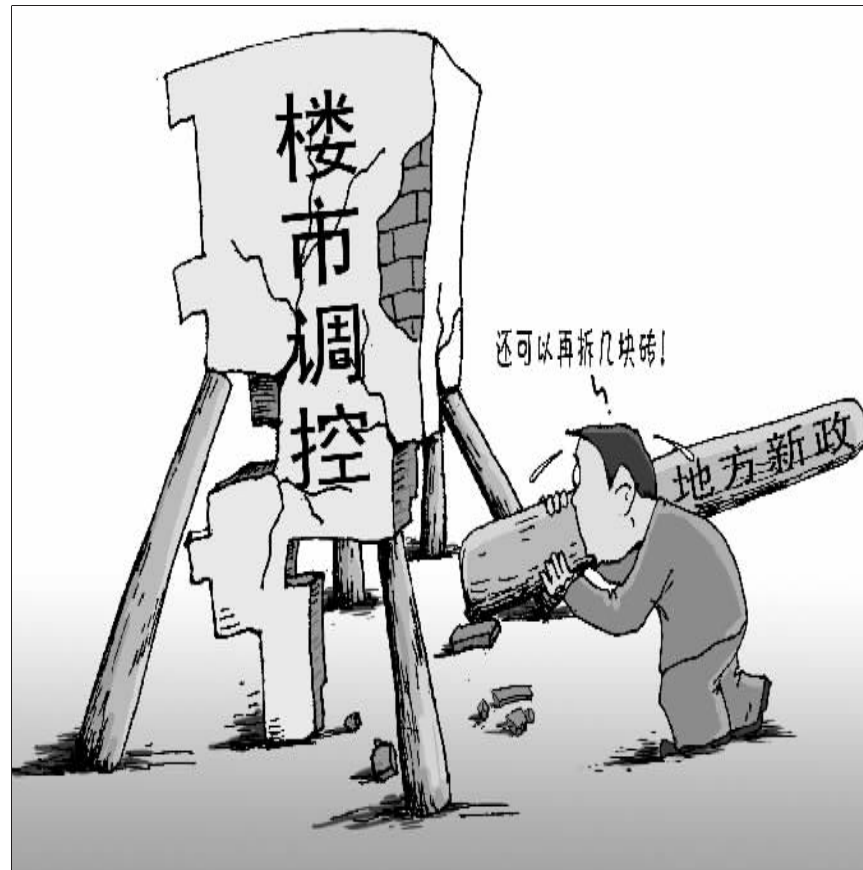
动严重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要对其在华经营的各项业务进行抵制。当然，倍顺集团的在华业务，自然就是“厦门倍顺超市”。

做生意不能不懂历史，翻翻胡雪岩和乔家大院的兴衰史就知道一二。愤怒的网友们的力量有多大？他们可不仅仅是在网络上发帖骂街那么简单。早前的家乐福超市、某日式连锁快餐店等，都遭遇过线下活动的真实抵制，当时舆情热度也是超高。

毫无疑问，厦门倍顺超市的历史课学得也不怎么样。5月13日，副总裁紧急辟谣，号召大家“理性爱国”，没想到网友不买账；即使当晚修改了网页，但以前标榜自己是“倍顺集团独资公司”的网站截图仍然在各大论坛和微博流传，再想删干净已经无济于事。更要命的是，居然有媒体这样写：“厦门倍顺方面否认了厦门倍顺是美资，然而该说法与2008年后建立的厦门官网说法矛盾。同时只否认厦门倍顺超市为美资，对其他各地倍顺超市未作同样声明。”总而言之，厦门倍顺自毁前程。

5月13日，中菲两国先后发布黄岩岛海域的禁渔令，这也预示着“黄岩岛事件”最终通过外交途径和平解决，网络上的抨击和批评终究会烟消云散。也许，这出大戏当中唯一能肯定的，就是网友们替厦门的消费者和供应商们，执掉了倍顺超市“真内资假外企”的外衣。没出事的时候就靠外资身份换来商誉加分，出事的时候就推得一干二净，这种墙头草两边倒的造假企业，抵制一下又何妨？那些尚未被发现的“厦门倍顺”企业，你们紧张不紧张？

作者系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特约观察员



楼市调控两年多，各种力量仍胶着。楼盘价格高位扛，地方政策暗中托。长远发展考虑少，短期功利作祟多。经济转型应加速，地产依赖要突破。

赵天奇/漫画 孙勇/诗

股市需要保护“傻瓜”利益

皮海洲

最近，证监会主席郭树清在出席券商创新发展研讨会时表示，圈钱时代一去不复返。郭树清告诫券商，要采取最严格、最严厉的措施，强化诚信责任和法律意识，把投资者当傻瓜来圈钱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股市圈钱时代是否一去不复返？这个问题时间会给出答案。不过，撇开“一去不复返”的争议，就“把投资者当傻瓜来圈钱”的表述来说，郭树清主席又说了一句大实话。这也是郭树清主席“敦言”风格的又一次展现。而以个人之见，郭树清的这句话至少表明了两个事实，表达了一个心愿。即在过去的20多年里，股市一直在把投资者当“傻瓜”；也正因此把投资者当成了“傻瓜”，所以股市一直在上演圈钱的故事。而作为证监会主席郭树清来说，希望这个圈钱时代从此一去不复返。

本人也希望“把投资者当傻瓜来圈钱的日子一去不复返”，这反映了中国股市的一种进步。毕竟，随着投资者的成熟，再把投资者当“傻瓜”来圈钱，这是一件难以为继的事情。不过，从中国股市的健康发展来说，本人更希望中国股市能达到另一种境界。即使投资者是“傻瓜”，股市也会尊重他们，并保护他们的利益，而不是欺负他们是“傻瓜”，因此来圈他们的钱。因为这涉及到股市的基本道德问题，就像生活中，一个正常人不应该欺负“傻瓜”、一个健康人不应该欺负智障者一样。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并形成一种保护“傻瓜”利益的股市文化，那么中国股市就会是一个告别了低级趣味的股市，是一个有着社会道德的股市，是一个健康发展的股市。

那么，股市如何能够形成一种保护“傻瓜”利益的文化氛围呢？重要的是制度建设要健康，要从制度建设上体现

出对投资者利益的保护。在这种健康的股市制度下，即使投资者是“傻瓜”，其利益也一样可以得到保护。

要做到这一点，首要是要确保股市有一个健康的新股发行制度。其最重要的标志是新股发行价格合理，能够体现出股票的投资价值所在。如果一家公司的新股发行市盈率达到了80倍，甚至上百倍，却还说公司具有如何如何的投资价值，这本身就是把投资者当“傻瓜”，是发行人缺少诚信的表现。这样的新股发行是不可能保护投资者利益的。更不可能保护“傻瓜”投资者的利益。在这个问题上，本人以为可以与回报投资者结合起来，即以新股发行价格为基准，要求上市公司的分红回报不低于某一标准。

其次，是要严厉打击弄虚作假、欺诈上市等违法违规行为，切实保护投资者利益。比如，对于上市公司造假上市的，就要像香港证监会查处洪良国际那

样，不仅股票要退市，而且还要冻结上市公司相应的资产，用以赔偿投资者损失，并且对有关责任人也要从严查处。像洪良国际的保荐机构兆丰资本，不仅被香港证监会撤销牌照，禁止其再为机构融资提供意见，而且还被处以4200万港元的天价罚款。在这种制度下，即使投资者是“傻瓜”，其利益也会得到保护。

此外，完善司法制度，引入集体诉讼制度，使“傻瓜”投资者的利益也会因为有集体诉讼制度而得到有效保护。目前的诉讼制度，不仅门槛高，而且程序复杂，正如深交所总经理宋丽萍指出，现在的直接诉讼和代表诉讼条件过严，导致最终能起诉者寥寥无几。因此，投资者的利益很难得到保护。相反，如果能够引入集体诉讼制度，那么，即便是“傻瓜”投资者，其利益也会因为有“聪明”投资者的存在而受到同等的保护。